浅论徐文淑对张恨水的历史影响

徐霁旻

徐文淑是张恨水的原配夫人。将近百年来，有关徐文淑与张恨水的传说，是风风雨雨，从未停息，而且人云亦云，版本很多。近年来，笔者几经了解，多处考察，稍稍理出一点思路。

徐文淑对张恨水的婚姻影响

张恨水受到徐文淑的影响，首要的当然是婚姻影响。

在清末民初，张恨水还在为自己的未来拼搏之际，母亲的一手包办，媒婆的将计就计，打破了张恨水才子佳人的美梦。

张恨水的妈妈替张恨水相亲，在徐文淑的故乡是风靡一时的新闻，也是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。实际上，是媒婆一手策划的连环掉包计。媒婆选择看戏的机会，指着徐文淑身材姣好的二妹，使得张恨水的母亲当即相中。而徐文淑的家人并不知情，以为张恨水的母亲相中了闺女。这件事，既不能责怪张恨水的母亲，也不能责怪徐文淑的家人。而是职业媒婆的一手绝作，凑合了这桩“美满的姻缘”。这也就自然引出了新婚之夜，张恨水出逃这个风传一时的新闻故事。

据我考证，相亲的掉包计与新婚之夜的新郎出逃，都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真实。但是，究其根源，双方都是受害者。徐文淑、张恨水都是这个故事的悲剧人物。特别是徐文淑，在刚刚结束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之后、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出现的1916年的前前后后，更是背负着历史的冤屈，背负着时代的嘲弄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。

徐文淑出身名门，虽算不得大家闺秀，也还是小家碧玉。

徐文淑的家乡，在远近闻名的源潭铺徐家楼。所谓徐家楼，就是徐家有连续3个楼房，依次是徐家高楼、徐家中楼、徐家底楼。数百年来，依旧此名。每座楼房之间，大约有一华里之距。其间是由环廊相通，如同江南园林中的环廊一样，瓦木结构，即使是雨天，人们不会走湿路。人们平常习惯上叫做“走马通途”。徐文淑的家就在徐家中楼。主楼曾经是三层楼，抗战时期，被日本鬼子当做炮楼，解放后，拆除砖木做了学校。如今，楼房中厅尚在。

徐文淑的亲房叔祖父，是清朝的戍边武将，曾经长期驻扎于甘肃、新疆地区，平定边防叛乱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清王朝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赐予正一品建威将军，并且上封三代（《潜山县志》，中华民国九年编纂，2000年重印版第305、395页）。如今，赐封的“建威将军”的牌匾，仍然保存完好。徐文淑12岁，这位71岁的将军叔祖父才故世。

徐文淑的父亲徐海山，是源潭镇有名的经馆塾师。也就是教四书五经的私塾先生。相貌堂堂，文才极好，名传乡里。诸如农村里出生的婴儿，都是请徐文淑的父亲起名字，乡下打官司告状，都是请徐文淑的父亲书写状子纸。徐文淑小时候，就是跟随着父亲，读书识字。诸如“三百千、四书五经”等等，大部分都会读会背。工笔小楷，一手好字。徐文淑是姐妹四人，依次是徐文淑、徐蕙淑、徐荷淑、徐杏淑（徐杏淑于2002年80岁故世）。名字皆为父亲所起。

我们今天知道了徐文淑的出身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徐文淑是何样的人。

但是，无论怎样，徐文淑终究是与张恨水结婚了。这是无以否定的历史事实。婚后的张恨水，如何看待徐文淑，这也是个挺复杂的历史问题。然而，张恨水作为旧文人，没有摆脱婚姻的缠绕，而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桩由母亲一手包办的婚姻。婚后，母亲看到儿子张恨水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叫住张恨水，面授“口谕”：“这门亲事是我的主张，你不满意，我可以理解。以后，你遇到合适的，再娶一房，我不反对。”张恨水不置可否，依然外出谋生。这就是张恨水所说的“二十一岁，我重别故乡，在外流浪。二十二年……婚姻问题又迫得我无可躲避”。（《我的小说过程》，原载1931年1月27日—2月2日《上海画报》；引自《张恨水散文》第3卷476页）

然而，张恨水与徐文淑的婚姻，虽然说不上幸福美满，但张恨水对徐文淑没有抛弃，没有摆脱，而是寄予了同情，寄予了怜悯。张恨水也尽到了一个“丈夫”的基本职责。与徐文淑若即若离，聚少离多，度过了一生。抗战时期，徐文淑写信给张恨水，篇幅很长，令张恨水非常感动，很想回到徐文淑身边生活一段时间。张恨水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倘若徐文淑嫁的不是我，凭她的性情，一定会过得极好。哪怕就算嫁了一个瞎子、瘸子，也会快乐得多。”但是，张恨水的这个良好愿望终于没有实现，他一直忙于写作。张恨水深深地感到遗憾的就是对徐文淑的冷落。这对一个以夫为纲的传统女子来说，是无法弥补的伤痛。从社会影响上说，相比于一代才子的张恨水，徐文淑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女人。但是，从忠诚爱情的角度上说，“徐文淑身上表现出来的风范与情愫，却比张恨水更加伟大”（《张恨水.鸳鸯蝴蝶梦姻缘》，上善若水。引自百度文库-教育专区-高等教育-文学）。张恨水表示自己的原配夫人徐文淑虽属包办婚姻，彼此也无感情基础，但她也是受害者，并无过错。徐文淑，虽然没有得到过张恨水的爱和温暖，但是，她得到了全家人的尊敬，并且，一直生活得很有尊严，婚姻虽然不如意，精神上却并不是十分的凄苦。徐文淑嫁给张恨水，虽然夫妻之间没有爱情，但徐文淑的生活还是完整的。徐文淑与鲁迅原配朱安、胡适原配江冬秀等等一样，她们往往被夫君的光芒所遮掩，同时也因夫君的光芒而流芳。但徐文淑与同时代的朱安相比，她应该算得上幸运，因为她嫁给了张恨水。

张恨水与徐文淑结婚时间，据推测当在1915年底与1916年初。徐文淑生于1898年，属相犬，其时正是18岁黄花闺女。这个年龄正是清末民初以至于到解放初期通常惯用的婚龄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最佳的结婚年龄。

诚然，此前的许许多多研究者，或是学术著作，大言不惭的描述张恨水娶徐文淑是“门不当户不对”，徐文淑的长相是多么的“丑陋”，新婚之夜张恨水的的妹妹张其范给她起名为“徐文淑”等等，以徐文淑的“村妇出身”来对比张恨水的“将门之后”，以徐文淑的“相貌丑陋”来反衬张恨水的“才子佳人”梦想，以徐文淑的“目不识丁”来突出张恨水的“才高八斗”，硬生生的将徐文淑与张恨水形成高下悬差，形成鲜明对比，只要是扯得上的尽量往徐文淑身上堆。其实这些几乎都是不实之谈。至少这些学者，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，没有脚踏实地的调查采访，没有进行详实的考证。无非都是人云亦云，以讹传讹。甚至张恨水什么时候相亲、什么时候结婚的具体年份，都是随意性的揣测，凭主观推断，以至于造成了从1913年到1918年五年跨度，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。

徐文淑对张恨水的创作影响

张恨水是大作家，小说家。而张恨水的小说题材，大部分是属于言情小说。爱情永远是他的创作题材。四大成名作，除了《八十一梦》，其余的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无不是爱情的杰作，无不是以爱情为主线，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与观众。

然而，张恨水早期创作的题材中，创作的男女主人翁的潜意识，或许有自我的“影子”，尤其存在着清末民初的包办婚姻的主线。如《旧新娘》、《梅花劫》，虽然这两部小说没有发表，我们不知道究竟写了什么，但是从小说的名字上，似乎看出一点提示性的思想信息。而婚后的张恨水，更是提笔创作了《青衫泪》《花月痕》《紫玉成烟》《未婚妻》等等爱情小说。这几部小说，“除了《紫玉成烟》而外，其余都放在书箱里成了烂纸，未曾进过排字房”。（《我的小说过程》，原载1931年1月27日——2一2日《上海画报》；引自《张恨水散文》第3卷477页）据介绍，“长篇小说《青衫泪》所描写的情节，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。”（《张恨水情归何处》，宋海东著，新华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3页）

诚然，没有发表的小说手稿烂掉了，我们依然从小说的篇名上，悟出张恨水的一些创作思想脉络，依然可以看出张恨水对于旧时婚姻的憧憬，依然可以分析出张恨水对于婚姻的美好期待。正是由于自己婚姻的不幸，才产生了对于美好婚姻的向往，才会产生对自由婚姻的憧憬。而这些向往与憧憬，又自然而然地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，描绘出来；通过自己的想象，把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爱情，寄托在小说的结构中，在小说的故事中，借此抒发自己的苦闷，借此舒缓自己内心的压抑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时隔十五年后，张恨水在回忆这段生活时，仍然记忆犹新。他说：“记得这时，我完全陶醉在两小无猜、旧时儿女的恋爱中，论起来，十分落伍的了。”（《我的小说过程》，原载1931年1月27日——2一2日《上海画报》，转引自《张恨水散文》第3卷477页）徐文淑对张恨水的创作，的的确确是有一定的影响，在取材方面、主人翁方面、情节结构方面，或多或少被曾经的婚姻笼罩着，被旧时的婚姻影响着，所以在张恨水的许许多多小说中，就有了诸如相爱的不能爱，不爱的偏偏被绑在一块的婚姻纠缠。

研究表明，张恨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，描写爱情才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变。正如张纪所说：“1931年，我爷爷与周南奶奶结合后，他的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细心的研究者发现，张恨水在三十年代写的言情小说，主人翁的爱情虽然仍是一见钟情，但才子佳人气少了，原先的理想化色彩褪去了，思想感情接近现实生活。或许，张恨水的爱情得到补偿之后，已经无心再给作品中的人物披上一层浪漫的轻纱。史学家们认为张恨水获得了爱情，无需再为天下儿女说相思了。”（《我所知道的张恨水》，张纪著，金城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54页）

由此可见，张恨水在婚姻的不幸之中，煎熬了十六七年，才出现了精神生活的转机。即使是二夫人胡秋霞的出现，也没有彻底改变他的爱情生活。从某种意义说说，胡秋霞是潜在的第二个徐文淑。只是这第二个徐文淑，是张恨水自己的重新选择的错误，张恨水同样的没有走出婚姻的误区。

然而，我们应当明白，无论是徐文淑，胡秋霞，还是周南，她们均对张恨水的创作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而这种影响，没有什么谁是谁非，也没有什么谁对谁错，最多只是谁多谁少而已。文化学者王华说：“应该从研究一名伟大作家的角度去看他的婚姻生活，张恨水不同创作高峰时期有过不同的女人，发挥过伟大的作用。”（《张恨水情归何处》，宋海东著，新华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219页）王华的这句话中所说的“女人”，我想应当包括张恨水社会生活中接触的女人，包括张恨水作品中所描写的女人，也包括他家庭生活中作为夫人的女人。对于这句话，张纪赞成，我同样赞成。

徐文淑对于张恨水的生活影响

虽然，徐文淑对于张恨水的研究工作而言，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枝节、细节与侧面，但徐文淑毕竟是张恨水的原配夫人，而且终生相随。徐文淑的出现，对张恨水的婚姻、家庭、思想、创作以及张恨水的人生道路，无不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。不管这种影响，是正面的、侧面的还是负面的，其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。正如闻涛先生评说的那样：“包办婚姻，没有为他营造出‘红袖添香’‘闺中唱和’的生活，反倒促使他走向社会体验人生，极大的丰富了他此后的创作。假如新娘是位美丽多情的姑娘，张恨水沉溺于温香软玉中，则后来的张恨水或许会大有不同。”（《张恨水传》，闻涛著，团结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27页）

徐文淑虽然饱受着婚姻的苦楚，但是徐文淑依然坚守着封建思想，嫁一夫着一主。徐文淑深深地知道自己难以给张恨水带来幸福的婚姻，默默地忍受着婚姻的苦果。但是，不能抹杀徐文淑对张恨水的“爱”。

徐文淑对张恨水的爱，是一种封建伦理式的大爱，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大爱，也是无私奉献式的大爱。

首先，徐文淑表现在婚姻的牺牲精神。徐文淑接受了张恨水娶第二房的事实。她不仅不反对，反而还为此高兴。因为只有娶第二房，才能够为张恨水填补爱情的不幸，才能为张恨水弥补婚姻的缺憾。自己无法“给”夫君的，可以通过再娶二房“给”夫君。张恨水于1923年与胡秋霞结婚之后，1926年，徐文淑随老家的大大小小一起到北京定居。徐文淑见到胡秋霞，不仅没有任何一丝醋意，反而视为亲妹妹，和睦相处。即使以后，张恨水又娶了第三房夫人周南，徐文淑同样没有一丝敌意。而且，还说服胡秋霞要面对现实，承认现实，真诚对待，友善相处。故而，因为娶了周南而引起的家庭“风波”，也就很快平息了。形成了一个32口人一起生活的人气旺盛的大家庭。

其次，徐文淑表现对孩子的抚爱精神。徐文淑自己生过两个孩子。一个出生就夭折了。另一个一岁多一点，带到娘家去，染上了病，也夭折了。因此，徐文淑的心理，时时是压抑的，时时是忏悔的，徐文淑时时觉得自己对不起夫君张恨水，忏悔自己没有给夫君带来婚姻的幸福，忏悔自己没有给张恨水生个一男半女。因而，她对胡秋霞的孩子视为己出，成天抱在手上，亲昵疼爱。1928年，胡秋霞生张小水时，因为是早产引起了“闷地生”（即出生不哭），徐文淑解开贴身衣裳，将血糊糊的婴儿贴在自己的胸部内衣上，用自己的体温“焐”活了。此后，徐文淑就与张小水建立了深深地“母子”情节。直到晚年的张小水，常常说道“我的命是大妈妈捡来的”。因而，1958年徐文淑在安庆市去世，张恨水命张小水带700块钱，千里奔丧，护送徐文淑灵柩回潜山县老家黄土岭安葬。徐文淑弥留之际，含糊不清地嘱咐身边的亲友，要把楼上茶叶盒里面的两枚戒指，分送给胡秋霞与周南，以示她的心意。张小水带回北京，完成了徐文淑的意愿。如今徐文淑墓碑上，立碑人就是这样写的“男晓水、孙继”。这里的“晓”“继”均系误字，实际上就是指张小水、张纪。张纪说：“我心头为之一颤，这个我从未见过的奶奶，这个连照片都未曾见过的奶奶，她是我爷爷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我们是她的后人，我很认真的烧纸，给大奶奶捎点钱去。值得欣慰的是我大奶奶的墓地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墓地。孤静的卧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，坟冢浑圆高大面对水库碧波，背靠巍巍青山。坟的四周是一片松涛翠柏。”（《我所知道的张恨水》，张纪著，金城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45页）

再次，徐文淑表现出一种忍耐精神。1938年，张恨水只身去重庆。徐文淑鼓励周南去找张恨水团聚。自己和胡秋霞在老家安居8年。1946年，张恨水带着周南回安庆短暂停留，然后就定居北京。徐文淑主动留守安庆，继续与张恨水天各一方。直到1953年，大病之后的张恨水只身南下旅行，回安庆小聚，才见到人生的最后一面。张小水每个月代替父亲张恨水寄生活费，顺便捎一封信。除了每个月，给北京的张小水回一封信，就没有了什么亲情的寄托。晚年的徐文淑，信奉佛教。每天早上，吟诵佛经。每逢初一十五，就到安庆市著名的迎江寺去拜佛。我们可以想到，徐文淑晚年是一人独自生活，可以想见，她内心的孤寂。

我们须得指出，张恨水虽然与徐文淑没有多少感情可言，但是张恨水自始至终，都没有遗弃徐文淑，时刻关注着徐文淑的生活。自从1946年定居北京以后，每个月都给徐文淑寄发生活费。正如张纪所言：“我爷爷并没有抛弃她，在他的稿费中，任何时候都有她生活费的安排”。（《我所知道的张恨水》，张纪著，金城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44页）开始是亲自寄，1949年生病之后，就是大儿子张小水代替寄发，如此直至1958年徐文淑病逝。张恨水并没有把旧社会的婚姻悲剧，强加在徐文淑的头上，而是对徐文淑寄予了同情，寄予了关爱。

**作者简介：徐霁旻，安徽省潜山县文物局副研究员。**